

# 党的第一个地下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熊崇善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地下出版社，就是李达同志创办和主持的人民出版社。它于一九二一年九月一日在上海成立，一九二三年与新青年社合并。人民出版社的创办对于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广泛传播马列主义，特别是系统介绍经典著作，用马列主义占领思想理论阵地，扩大革命影响，起了重大作用。

一九二一年七月，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举了中央领导机关，成立了中央局，李达同志被选为中央局宣传部主任。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奋斗）目标的第一个决议》中，确定了宣传工作的方针与任务，决定由中央或地方出版杂志、日报、周报、百科全书、小册子和临时传单，还明确规定：“出版物，不论属于中央或地方，皆应由我党同志直接管理与编辑。”（载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一大”前后》，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李达同志作为中央宣传部主任负责主编人民出版社丛书和党的秘密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并参加党的公开机关刊物《新青年》的编辑工作。

人民出版社设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六二五号，这是一所一楼一底的房子，它既是中央宣传部的办公处，也是李达同志的寓所。进门是天井，落地榻扇门内是客堂，楼上是卧室兼书房，楼下是厨房，还有一个亭子间。李达同志就在这个亭子间主编《共产党》月刊

和人民出版社丛书。各地同中央局联系的信件都寄到这里，同志们来上海也先到这里接洽。陈独秀经常来到这里审阅各项文件。鉴于人民出版社的社址是党的宣传机关所在地，是党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个据点，而它的出版物又是反动派严加查禁的革命书籍，时时有被他们袭击的危险，所以必须格外警惕。为了避免敌人注意，便于秘密出版，故意把刊印在出版物上的社址填写为“广州昌兴新街二十六号”。

人民出版社是适应革命发展需要而成立的。在我们党的创建时期，马克思主义已逐步得到传播，但其它各派社会主义学说也打着新思潮的旗号鱼目混珠，争夺阵地。广大要求革命的群众一时还难以分辨，无所适从。如果不进一步扩大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要使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抵御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侵袭，壮大党的队伍，发展革命势力是不可能的。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党在思想领域开展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批判的同时，迅速建立了党的出版发行机构，有计划地大量出版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书籍，以便为共产主义信仰者提供思想武器，为信仰不坚者祛疑解惑，团结和扩大革命者的队伍。人民出版社成立时发表了一个通告，刊登在一九二一年九月一日发行的《新青年》九卷五号上。这

个通告简要论述了该刊创办的宗旨与任务：

“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人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它还郑重宣告：“本社出版品的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的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各书或编或译，都经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这一点同人相信必能满足读者的要求，特在这里慎重声明。”这个通告还列出了它计划出版的书目，其中《马克思全书》十五种，《列宁全书》十四种，《康民尼斯特丛书》即共产主义者丛书十一种，其它九种。从它开列的这些书目来看，更加鲜明地表露了人民出版社的宗旨与任务。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局在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的《通告》中明确规定：“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载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一大”前后》）李达同志以极大的努力去完成中央所规定的任务，工作很有成效。根据我们现时所能见到的出版物以及刊载在当时报刊的书目广告的资料来看，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它出版的书籍有十八种。其中：

《马克思全书》三种：《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资本论入门》；

《列宁全书》六种：《列宁传》、《国家与革命》、《劳农会之建设》、《讨论进行计划书》、《共产党礼拜六》、《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

《康民尼斯特丛书》四种：《共产党底计划》、《俄国共产党党纲》、《国际劳动运动中重要时事问题》、《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

其它五种：《劳动运动史》、《俄国革命纪实》、《李卜克内西纪念》、《两个工人谈话》、《太平洋会议与吾人之态度》等。

此外，《共产党》月刊从第六期起由人民

出版社发行。

人民出版社是党的重要宣传阵地。上述这些书刊，在革命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例如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最早的中文全译本，一九一九年九月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初版，这是对毛泽东等同志建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有过深刻影响的一本经典著作，人民出版社成立后，立即重印这本书。在当时国内还缺乏马列主义著作，许多人包括一些共产主义信仰者还不能直接阅读外文书籍的情况下，人民出版社大量出版发行这样一些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对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起了不小的作用。

人民出版社的出版物的显著特点，是它的出版目的性明确，内容密切配合党的宣传意图。它不仅出版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共产党的知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介绍等著作，还出版了一些通俗宣传的小册子。例如，为纪念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坚强战士卡尔·李卜克内西牺牲三周年而出版了《李卜克内西纪念》一书。在该书中李达同志撰写的《李卜克内西传》，热烈歌颂了李卜克内西的“革命精神永远不死”，高度评价了他和卢森堡领导的“斯巴达卡斯团”于一九一九年一月举行的工人阶级武装起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意义，强烈谴责德国反动政府屠杀他们的血腥罪行，表示“我们追想着李卜克内西底伟大”，一定“要努力奋斗，继承他的革命精神”。（《李达文集》第一卷，第122页）这些通俗小册子的出版对于当时的青年学生、工人的影响较大，深受他们的欢迎，对他们参加革命运动起了有力的宣传促进作用。

李达同志为人民出版社的创办和出版发行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不仅亲自担任主编并亲自译稿和撰稿，最困难的时候，他甚至一个人担负起编辑、出版、发行的全部工作。李达同志曾回忆说：“‘人民出版社’也在辅德里。那时，我担任出版社主编，共出

版了十四种刊物以及临时性的小册子。那时付印、校对、发行工作都是我个人担任的。分发到外埠去的刊物都是经过轮船的水手及杂务工输送的”。（见李达《回忆党的早期活动》，载《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在回顾当年的历史情况时还说道：“从一九二一年七月到一九二二年六月，中央工作部只有三人，以后只有二个人（一九二二年一月，张国焘因他主持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被巡捕搜查，转移北京。于是，中央局在上海只剩下陈独秀和李达两个人——引者注）此外并无工作人员。只有宣传工作方面雇了一个工人做包装书籍和寄递书籍的工作。中央工作部除了出版《新青年》、《共产党》月刊和“人民出版社”的书籍以外，就是阅看各地组织的文件，并给以适当的指示。”（见李达《回忆老渔阳里二号和党的“一大”、“二大”》，载《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1辑）由此可见，李达同志是在担任中央局的许多重要任务的情况下主持人民出版社工作的。他一个人肩负这样繁重的工作任务，可以想象到他要克服多大的困难，需要进行多么紧张而又艰苦的战斗，才能完成这样浩繁的工作量。如果没有旺盛的革命热情，没有克服困难的革命毅力，是不可能完成这些历史重任的。

人民出版社成立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它传播革命真理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在开创党的出版发行工作方面所建立的革命传统是世代相传的。党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于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又在上海创办了上海书店。正如曹予庭同志在《上海书店——党的

早期出版发行机构》一文中所说：“上海书店继承了党的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的光荣传统，致力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和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宣传，和当时几个城市的进步书刊相配合，在广大群众中扩大了革命的影响”。（见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78年第2辑）一九三一年九月，党在国民党血腥统治的北方地区，沿用人民出版社的名号，进行出版发行工作。该出版社的主持人王辛垦同志在《忆北方人民出版社》一文中说：当时，为“确定出版社的名号”，“经过再三地考虑和斟酌，由于一九二一——二二年的人民出版社对读者是很有影响的，而且有些北方的青年们对新生读书社是熟悉的，于是，就确定了：出版为人民出版社，发行为新生读书社”，并且还将在党的第一个出版社的优良出版物重印发行。丁珉同志在《记北方人民出版社》一文中也说：“一九三一年九月，北方出现了人民出版社。这个出版社后于广州的人民出版社十年（按：此系上海的人民出版社之误），其传统的精神与实质，是连续的、一贯的。”（以上引文见张静庐辑注的《中国现代出版史料》补编、乙编）在我们党诞生六十周年纪念的今天，“人民出版社”的光荣名号更加鲜艳夺目，其革命精神也更加发扬光大了。

时代在前进，党的出版事业在发展，但我们不应忘记开拓者的辛劳。在我们党的创建时期，李达同志为创办和主持人民出版社的工作，为开辟和扩大党的宣传理论阵地所建立的功绩，应当记入史册！

